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孟繁华:评论与创作是对话关系,不是“指导”关系



访谈

年度文学评论:
《散文的气质》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感言

让文学评论的“算力”早日得心应手

——孟繁华

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使我有机会思考自身的存在价值。我用文学评论的方式试图总结作家朋友的内心,交流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在始终维护或改变某些事物的过程中体现出我们的共识。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也曾体验过不期而遇的虚无和茫然,但我知道这就是人生。

“算力”已成为科技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打造出的科技神话正如日中天。令人担忧的是,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的“算力”有些力不从心,这成为了当代文学中的尴尬问题。而改变这种状况,应是所有文学评论家共同的期待。

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文学评论的形象逐渐得到改变,让文学评论的“算力”早日得心应手。我相信,文学评论与读者的愉悦相遇终会到来。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编委。著有《孟繁华文集》十卷等三十多部,部分著作译为英文、法文、日文等多种语言。

进入讲述,就是虚构的开始

羊城晚报:几十年来,您先后出版了《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国20世纪文学学术史》《新世纪文学论稿》等书,视野宏阔。而《散文的气质》则是集中评述十八位当代作者的散文作品,这是一种积少成多的随手辑录,还是有意为之?两种写作方法有何不同?

孟繁华:我没有系统或刻意地研究过散文。我觉得散文和小说是非常不同的两种文体。小说有系统的理论,无论研究还是评论,都有理论可以依托,而散文则不同,散文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而该说话散文作者在文章中都说了,留给评论家的话语空间有限。

因此,我的文学评论——除了文学史研究之外,基本是在小说领域展开。《散文的气质》一书本来不在出书计划中,后来偶然发现写散文的评论文章居然也有一些,于是再在编辑的鼓励下汇总成书。

至于写作方法和感受,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专著是对专业领域某个问题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它要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内,是对“学术规划”的具体实践;《散文的气质》一书的写作,则是“一时兴起”“见文起意”的临时行为。它们各有各的价值。

羊城晚报:书中评述的十八位散文作者大多是您有交往的师友,为在世的当代作家写评论,会不会增加褒贬的难度?分寸感如何拿捏?

孟繁华:这十八位散文作家,应该说都是当代散文创作的核心作家。他们的散文作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个时代散文创作的时代性和文学成就。我和他们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他们中有老师,有朋友,或者是熟悉的人。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现实,我想每个评论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题。只能这么说吧,我选择评论的散文作家,都是我喜欢的作家。这个“喜欢”在评论的时候肯定会有种预设的“带人”。既然选择了他们,情感就已经有了倾向。

如何在表达欣赏甚至激赏时,适时地控制就是一种考验。而分寸感的把握,也是批评家对自己评论理论和人格分量的把控。

羊城晚报:书名为《散文的气质》,“气质”一般是用来形容人的,为什么您会把它用来形容散文?

孟繁华:“气质”是形容人的,也可以形容文,文章的整体风貌给我们的感觉就可以称为“气质”。我们常说“文如其人”就是这个意思,人的综合素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气质。在我看来,散文作者最重要的“气质”是见识、博学、性情与深刻。

羊城晚报:“形散而神不散”曾经是散文的核心要义,这个界定现在还有效吗?

孟繁华:“形散神不散”最初是肖云儒先生在1961年《人民日报》“笔谈散文”专栏的一篇名为《形散神不散》的短文中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在那个时代影响很大,也非常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

但在我看来,这个说法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要求散文主题明确的时代已经过去。好的散文不是“形散神不散”,而是文章整体风貌显示的一种综合气质,比如,正大、优雅、高贵、深刻和浩然之气等。无论是人间烟火还是“诗和远方”,有了这样的气质,就是好散文。

羊城晚报:您认为散文可以虚构吗?

孟繁华:散文当然可以虚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史记》中虚构俯拾皆是。从叙述学的角度说,只要进入讲述,就是虚构的开始。不仅散文,历史也是如此。

作家邓一光为孟繁华(右)颁奖



文学评论最重要的品质是诚恳

羊城晚报:您的博士论文《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把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和文化心理进行对比分析,在您看来,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否面临困境?

孟繁华:

这个问题很复杂。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面对的问题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处理的问题和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

孟繁华:

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

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焦虑。

孟繁华:

这个焦虑至今仍然没有过去。这

孟繁华:

是80年代遗留的问题,现在虽然

孟繁华:

还要面对,但已经不那么迫切;新的

孟繁华:

、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比如人工

孟繁华:

智能和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问题,

孟繁华:

可能更贴近,更需要我们面对。

孟繁华:

人类的理性是否能够控制资

孟繁华:

本和利益的欲望?人类是否创造

孟繁华:

了自己的掘墓人?这些问题不是

危言耸听。在这样的境遇中,人文知识分子价值如何体现,应该是我们深感焦虑的。

羊城晚报: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研究家有何不同?您自己的定位更倾向于哪一个?

孟繁华:

我既是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也是一个一直在文学现场

的文学评论家。我的专著比如《梦

幻与宿命》《激情岁月》《众

神狂欢》《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中

国当代文学通论》等,都是研究性的

著作;我出版的文集,大多是文学

现场的评论。

这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是不

矛盾的。有了文学史的研究,对现

场的文学评论会多一点历史感,会

有文学史的参照而免于武断和主

观;有了现场的评论经验和感受,

会使文学史的研究更具当下性。

羊城晚报:您认为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孟繁华:一个普遍的误解是,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指导关系。这是不对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对话关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一般来说,文学创作主要是面对生活和心灵,从生活中提炼出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完成作家对生活和人性的认知及表达;文学评论当然也要面对生活,但它更要面对作家创作的作品,这个作品是艺术品。

羊城晚报:文学评论最重要的

品质是什么?

孟繁华:诚恳。这一点和作家面对生活的品质要求是一致的。不诚恳就是口是心非,口是心非无论创作还是评论都可能做好。这是一个常识,但常识恰恰最难做到。

羊城晚报:文学评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孟繁华:诚恳。这一点和作家面对生活的品质要求是一致的。不诚恳就是口是心非,口是心非无论创作还是评论都可能做好。这是一个常识,但常识恰恰最难做到。

羊城晚报:您是否也有此“跨界”打算?

孟繁华:

我没想过跨界计划,踏踏实实做文学研究就很好了。

评论家写小说不叫跨界

他们的研究或创作反而更丰富,更有创造性,更引人瞩目。我要向他们学习。

孟繁华:

我没有退休,仍在工作,

但迟早要退休。

我想,

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一个文学评论家,

退休不退休和文学工作没有关系。

即便

退休

我

也不会中断学术

生涯,

但工作对象或性质可能会发

生一些变化。

我的老教师谢冕先生、

洪子诚先生等,均已退休多年,但

历史

也是如此。

但

我

研究或创作反而更丰富,

更有创造性,更引人瞩目。我要向他们学习。

羊城晚报:

有很多文学评论家

“跨界”写小说,您对此有何评价?

孟繁华:

现在一看到某些事情就大惊小怪,其实非常没有必要。

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教授都是作家、诗人。

鲁迅、胡适自不必说,再看洪子诚先生等,均已退休多年,但

历史也是如此。

因此,在我看来,评论家写小说不叫跨界,

他们还都在文学界里,至于写得怎样那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评论家当了建筑师、当了AI的创造者或者航天员,那才叫跨界。

羊城晚报:您是否也有此“跨界”打算?

孟繁华:

我没想过跨界计划,踏踏实实做文学研究就很好了。

周嘉宁:旁观者才能看到“浪”的全貌

访谈

试图提供尽量多的视角

羊城晚报:将《再见日食》《浪的景观》《明日派对》三个故事集纳在一本书中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周嘉宁:因为在2018年到2021年这段时间,我只写了这三个中篇,放在一起是梳理成章的。另一方面,我上一本书《基本美》在2018年出版,在写书中最后一篇同名小说《基本美》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写作的语言风格有一些变化。

中篇小说集《浪的景观》我觉得是对这种变化进行巩固,探讨的问题也是从《基本美》开始的,它们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一直到写完最后一篇《明日派对》,可能差不多是我一个写作阶段的结束。那时我思考的一些问题,包括世纪之交,以及全球化对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影响等,在这三个中篇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之后我要开始其他内容题材的写作了。

羊城晚报:写作《浪的景观》为书名,是否代表了对同名小说《浪的景观》的偏爱?

周嘉宁:如果从小说本身来说,第一篇《再见日食》和第二篇《浪的景观》我都挺喜欢的,但是《浪的景观》的意象总体上更能够表达我这三篇小说想传递的内容。

羊城晚报:“浪的景观”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观”,有什么隐喻?

周嘉宁:我并没有想去隐喻什么,写作的时候脑海当中出现的那些场景是非常直觉性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一代人看某一波“浪潮”的起伏,我周围有一些胆大的人,有一些幸运的人,有一些在关键时刻做出很好决策的人,他们捕捉到了踩上浪尖的最好时机。

经常有人问我是什么始终维持着我写作,这个问题在回答了很多次以后,我才真正发现,其实并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在维持着我的写作,而我得以维持我的日常生活,也让我得以不断在现实和虚构世界之间一再构建通道。

然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真正踩在浪尖上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更多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真正站在“浪”里面的人没有办法看到整个“浪”的全貌,反而是一些旁观者才能看到。

我在写的时候也试图提供尽量多的视角,不仅是我的视角,也希望我的小说主人公可以提供其他视角给读者。

羊城晚报:写作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表达,听罗大佑的演唱会、组乐队、录电台节目、卖服装……这些小说中的情节都源自您的青春经历吗?

周嘉宁:基本上都是我所看到的时代风貌,那时我周围大部分人都会听电台,有很多人会写信,还有朋友会去参加电台主持人选拔比赛,等等。

包括在《浪的景观》中我写的那些外贸市场的故事,我自己肯定没有卖过衣服,但是在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我对上海的外贸市场非常了解,经常去那边,也在那边交到一些朋友。

虽然说现在外贸市场已经拆了,也很少有人听电台了,但是这些记忆对我来说是相当珍贵的,而且是没有办法复制的。

羊城晚报:三篇小说的结局似乎都不是明确的“大喜”或“大悲”,在设计时您是如何考虑的?

周嘉宁:我自认为这些结局都还是比较好的,是朝上走的。我不想给当中任何一个人下定论。主人公们的命运在故事结束后,仍然在虚构的世界里继续延伸下去,限定性的结尾对这些主人公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世界仍然在变化。

“未来可期”是人生的整体基调

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跟现在的年轻人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所写的那些年轻人基本跨越了两个时代。那一代人经历了非常剧烈的变化,整个青春期都是在这些剧烈变化中度过的,他们会觉得变化是正常的,不变和稳定的东西反而是不正常的。

周嘉宁:我其实不是特别清楚

现在最年轻的那些人,他们生活中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我看到的东西都是社交媒体传递给我的,这里面肯定有偏差。